



本报与海外网记者采访成思危(左二)后合影留念

78岁的成思危，从第九、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高位上卸任后，依然坚持学习、研究，尽一份报国之志。7月18日，当记者在他的办公室里见到他时，一身轻便夏装的成思危笑脸相迎，温文尔雅，思路敏捷，平易近人。

三次选择皆为报国

成思危是成家五个孩子中的独子，父亲成舍我是杰出的一代报人，母亲萧宗让曾留学法国，书香门第的他自幼便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

成思危在北平时，已深受鲁迅、茅盾、巴金等进步作家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当数《家》、《春》、《秋》“激流三部曲”。在《家》这部著作中，觉慧毅然决然离开家，寻得了人生道路。在成思危看来，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就像是觉慧的真实写照。

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北平，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少年时代的成思危，对国民党的统治甚为反感。1948年底，随父亲举家搬迁到香港后，成思危就读于左派学校，受社会进步思想的影响，1951年，年仅16岁的成思危做出了他人生第一个重要转折，毅然决然地抛弃了优越的家庭生活，抱着对新中国的憧憬和理想，回到广州。自此，他开始了漫长的跨越两个世纪的报国之旅。



如果成长永远是一个模式，顺理成章，洁白无瑕，那不是成长，那是不合格的文学创作。成长是真实、立体的，也会让人有一些担心，但不出格，守住底线就行。

——白岩松对于培养孩子有自己的心得。



非常好声音

“长、空、假”已成为公文写作通病，公文写作应更具时代性、鲜活。实现文风的转变是撬动良好社会风气，包括党风、政风、民风的杠杆。

——中国公文写作研究会会长桂维民指出。

成思危的三次人生

本报记者 叶晓楠 石畅

他曾在16岁时脱离家庭，从香港回到内地；他曾在46岁时，出国转修经济管理，并被誉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在60岁本欲退休之际，他又走上从政之路，成就人生最辉煌的11年——



转折



扫描二维码即可看视频

顺境不懈怠 逆境不沉沦

成思危的人生写满了自强不息，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顺境时不懈怠，逆境时不沉沦”。

“文革”结束，不少与成思危一样怀着报国理想投身新中国的香港青年，怀揣复杂的情感，离开了大陆，而成思危选择了留下。

放弃化工，当年在朋友们看来，成思危这是另起炉灶从零开始，并非明智之举。然而，成思危认定了的事，就一定会坚持下去。

1981年，46岁的成思危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管理研究院学习，由于是从化工专业转学管理，最初，别人一小时能读四五十页书，成思危则只能在字典的帮助下读2-3页书，难度很大。但在短短不到三年时间里，成思危愣是凭着一股韧劲儿，发表了十来篇学术论文，赢得了奖学金。当他把最后一学期的成绩单给他从台湾赶来已80多岁高龄的老父亲看时，成绩单上是三个A和一个A+。“我这一生都不肯轻易表达情感的老父亲也夸我：没想到你近50岁的人了，还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

成思危说，“虽然我未在湖南生活过，但可能还是继承了湖南人的内在性格：一旦看准了的问题，九头牛也拉不转。就像我父亲一样，敢于屡败屡战。幸运的是，我这些选择都对了，但当时看来，都冒着风险。”

成思危记得，12岁生日时，他拿着刚买的纪念册，去找父亲写几句祝福的话，父亲不假思索地写了4个字：自强不息。成思危感慨地说，他一生都在践行父亲给他写的这四个字。若干年后，成思危在女儿12岁生日的时候，也将“自强不息”这四个字，写在女儿的笔记本上作为赠语。

敢于直言真话实话

成思危被誉为“中国风险投资之

父”，他在经济领域著述颇多，因其特殊的政治身份，他的一些言论一经发表便引起股市震动，因此也招致了不少批评的声音。但时间证明，他说的那些可能有些人并不爱听的话是真实、实话。

成思危分析说，最近几年中国股市的发展，“宏观来看进步不小，微观来看问题不少”，应该让股市发挥扶优淘劣的功能，让好企业以低成本实现融资，并且使投资者总体上得到比较合理的回报。目前，中国投资者信心受挫，但股市总会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



成思危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慷慨陈词岂能皆如人意，鞠躬尽瘁但求无愧于心。”此前，成思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说到这句话，赢得全场掌声。当天，成思危为我们讲起人生经历时，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当股市最火热的时候，他理性地给民众浇了浇“冷水”，现在，股市低迷，成思危却表现出了信心，“我的心不是凭空的，从长远来看股市还是会向上走的。”

现在，成思危已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位置上退下来有5年了，可他依然担任着中科院大学管理学院院长、中科院虚拟经济和大数据科学研究中心的主任，每个月仍在坚持授课，为学生讲授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和默顿的《金融学》。今年，他还将出版《中国股市的分析》和《虚拟经济发展史》，力图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来为中国梦的实现添一份力量。



我想把艰巨的研究工作留给自己，再用读者最能接受的语言表达出来，带给读者轻松、愉悦的感觉。轻松好读和严谨认真不构成矛盾冲突。态度是严肃的，但表述是活泼的。

——易中天这样界定自己作品的风格。



开门办春晚非常好，将各路高手请进来。春晚应该回归到它的原点，就是要博大众一笑，既要符合年文化的特点，又要符合文艺规律。

——冯骥才对于今年“开门办春晚”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李婷婷辑)

开放是把别人的东西转成自己的东西，所以本土化是很开放的，是不能断了外面的源头的。

——陈冠中对于本土文化和开放的关系是这样认为的。

满头银发一丝不乱，面色红润，腰板笔直，声音浑厚、洪亮，见到邬沧萍先生时，很难将眼前这位91岁的健康老人与“耄耋”两字相联系。

人口学的开拓者 老年学的奠基者

邬沧萍

91岁依然忙碌

李扬



调查发现，从新中国成立到70年代末，已新增6亿人口，其中3亿多是妇女，按照这个基数，只要每人生一个孩子就是3亿，每人生2个就6亿！

形势非常严峻，1979年2月，邬沧萍和刘铮在《人民日报》共同发表理论文章《人口非控制不可》，论证了控制人口增长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这篇理论文章为之后人口科学的蓬勃发展吹响了号角。

随后，由邬沧萍起草，与刘铮、林富德共同撰写的《对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五点建议》递交到国务院，报告分析认为，由于失去了控制人口的最佳时机，一般的人口控制已经不行，必须进行严格的人口控制，“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坚决杜绝生三个孩子，对于生两个，不反对、不鼓励也不支持。”这份报告是“文革”结束以后，全国第一个向上报送的人口研究报告，其观点被认为是“中国控制人口最佳的、最可行的建议”。

由于实行计划生育，中国13亿人口的到来推迟了4年，世界60亿人口到来的时间也推迟了4年，中国成为世界上生育率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严格控制人口利大于弊，不然中国绝没有今天这样的发展机遇。”邬先生感慨道。

意识到，人口问题是一个致命伤，是中国的大问题。”

1953年，邬沧萍参加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人口已经超过6亿的统计数据出来后，全国为之震惊。知识分子、党内党外都在讨论人口问题，较多的倾向意见是要解决人口问题，马寅初在1957年发表了《新人口论》。就在大家热情高涨的时候，1957年，“反右”风暴席卷而来。人口控制也失去了最好的机遇，导致人口增长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达到世界人口增长的最高峰。

提出控制人口最可行建议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高扬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风帆。国家统计局、人口和计划生育办公室与中国人民大学一起进行了全国性的人口预测调查，



邬沧萍去年还出版了50万字的新书《老龄社会与和谐社会》

归国参加第一次人口普查

邬沧萍先生83岁才离开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的办公室，但是回家后，他始终闲不住，甚至更忙碌，不仅指导博士生、编书、写文章，还要定期在清华大学授课。去年，邬先生主编的50万字著作《老龄社会与和谐社会》出版，90岁高龄仍有新作出版，令晚辈后学钦佩。

1922年，邬沧萍出生于广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大学毕业后考入上海海关学院，分配到香港九龙海关当公务员，捧的是“金饭碗”。其后，他自费到美国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求学。1950年，邬沧萍响应党的号召回国，后来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统计学。

“其实，在美国读书时，我就对人口问题很有兴趣。”当时全世界刚兴起国民计算研究，邬沧萍选了一门叫“国民收入的人均比较”的课，他研究了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研究结果表明：“若按人均来算，我们的基本能源没有不短缺的，所以那时我

